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Dangdai Xuezhe Renwen Luncong

论英汉文化翻译

● 的理论与实践

● 李延林 夏志明 谢孝兰等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英汉文化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李延林等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10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20辑)

ISBN 978-7-80250-083-9

I. 论…

II. 李…

III. 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887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发行部) 64963101(邮 购)

64924880(总编室) 64963107(一编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10.75 印张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390.00 元(全 16 册) ISBN 978-7-80250-083-9/F·277



惯表达法的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不同的语言习惯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征。语言差异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交际出现困难。这些交际困难多半不是由于对外来语的词汇意义不理解,而是由于不理解这些词汇背后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涵;交际中最严重的错误,往往出自错误的文化假想。

作为专门论述英汉文化翻译的著作,自然要涉及与跨文化交际有关的学科。这是因为文化翻译本身是跨学科或曰边缘学科理论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科学产物,必将发展成为一门交叉性学科——文化翻译学,并自成一体;它涉及到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语言国情学、翻译学等学科领域,必将能构建自己科学而又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原则及方法。研究英汉文化翻译是为建立英汉文化翻译学学科体系所跨出的第一步,其所作研究均会涉及到该学科在未来的建立。它以跨文化学、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语言国情学、翻译学等为依据,把语言中的文化现象作为直接对象加以特别研究,探索语言文化与翻译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关的语言转换规律。我们希望,我们所撰写的这本《论英汉文化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将为翻译界结合翻译中的文化转向深入开展英汉文化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逐步建立英汉文化翻译学学科体系,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加本书撰写的还有伍先禄、葛文峰、何敏、杨根培、胡芳毅、陈英缙、郭旭明、李杨源、邹玮烨、谭艳阳、谢巧静、彭安辉、彭君竹、陈莉、张金宏、汪平、张赛妮、刘玘芳、徐春霞、蒋丽平、皮继伟、钱进、欧亚美。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他们在未来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

本书适于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广大科研工作者,高校教育工作者,特别适合目前在校学习英语与英汉翻译或有志于学



文化飞散与语际转换视角下译者对源语文化应有的责任 …	(88)
汉语文学作品英译中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兼谈杨宪益在《儒林外史》中的文化翻译 ^① ……………	(95)
庞德所译中国古诗的意象转换 ……………	(104)

第二部分 文化翻译实践研究

宋词英译中的文化因素传达 ……………	(117)
范式与文化传递:宋词翻译双璧……………	(125)
全球化语境下英汉文化负载词可译性趋势 ……………	(138)
从目的论角度看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可译性 ……………	(146)
跨文化语境下外宣翻译的信息耗散与重构 ……………	(153)
从《红楼梦》两译本之文化信息处理看隐性权力话语对译者的影响 ……………	(165)
汉英文学作品中“红色”及其相关词语的内涵意义 ……………	(174)
英汉语“红色”喻人的交际功能与翻译 ……………	(181)
文化领域中颜色词“红”的比较与翻译 ……………	(188)
英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及在商务英语中的应用 ……………	(196)
汉英文化中“黑色”及其相关词语的表达 ……………	(203)
汉英文化中“白色”及某些相关词语的涵义 ……………	(210)
英语比喻表达形式及其来源与汉译 ……………	(217)
从文化翻译观视角看影片名翻译 ……………	(226)
从欠额翻译与文化补偿角度谈歇后语的英译 ……………	(233)



行一些无可回避的交往,这种交往在客观上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沟通作用。而各国深深的独特性便使各具特点的典章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应运而生。在未建立起现代交通、通讯设备网络的情况下,由于相互关系的融洽,不论部落还是国家,相距越近交往就越多,沟通的障碍就小;而相距越远交往就越少,沟通就成了问题。东方与西方各国之间的情况更能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中国与英国相隔万里,恰好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其差异之大、沟通之难自不待言。如果说肤色不同会使民族差异表面化,那么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差别更会使民族差异具体化、明朗化。作为中英两个不同民族,一旦进行交往就有必要弄清中英文这两种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在表达上的千差万别或在使用中较大的随意性。从话语交际的角度来看,文化始终是代表两个不同民族的交际双方必须注意的一大问题,现在结合一些具体事例加以讨论。

把英文作为外语来学习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学习者在学习的初、中级阶段总感到很难适应,遣词造句等总易出错等,由此便生出一些对立厌倦之情绪。主要原因是本族的语言文化已对其思想动机、思维方式等产生了负面作用与影响,已在其心里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固定模式,在与外族文化接触时又常常不自觉地对本族文化产生了一种偏爱或优越感,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外族文化的消极抵制。比如说,有的中国学生就用“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这样的陈词滥调来表示对外国语言文化的拒绝接受或学习。有的学生在他们的书面或口头交际中总喜欢用中文的句型结构或修辞手段去套用英文的句型结构或修辞,如英国文化要求讲英语的人对别人的称赞或夸奖等表示接受性的感谢,如果一方说:“You have cooked a wonderful meal.”另一方就须用“Thanks //Thanks a lot /a great deal //Much/Many thanks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等予以回答,以示对对方的肯定与尊重,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往往对别人的称赞等常常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着头,甚至用“自贬”、“否认”的语言表示拒绝,以示礼



为它见于话语交际中的特殊场合且易成为话语交际者双方最初的沟通障碍,与彼此不熟悉的文化有关,与交际的成败有直接关系,一旦熟悉了彼此间的文化,也就无障碍了,更无特殊之处了。英语 Can I help you? 或 What can I do for you? 虽为两个浅易句,凡略懂英文者皆知,一般说来其所涉及到的文化因素应归入显性文化类,但相对特定的人与特定的场合而言就转化为隐性文化了。新到岗的售货员对顾客说时,其含义为“您想买(要)点什么?(但他在上岗以前,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尽管反复记诵,仍感到此语未必适合于他与顾客间的交往),但一旦习惯了并能用于交际中,他就自觉很平常了,更不可能带来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④假设这位售货员他日到某英国人的房间或办公室前,这时若室内英国人说上一句“Can I help you?”,其含义是“您找谁?”或“您有什么事?”若售货员对此语的理解仅囿于其职业范围内,他便失败了,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说明她没有掌握该语句在特殊场合所隐含的特殊文化因素,仅将其理解停留在显性文化之上。

总之,不管话语交际中的文化问题是多么复杂,只要交际双方本着从相互尊重、虚心学习、坦诚相见、密切合作的原则出发,辩证地对待民族差异带来的文化差异,即使是复杂的问题也能予以解决,至于达到交际目的更是不难解决。

注 释:

- ① 陈文伯:《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6页。
- ② ③ 潘晓蕙:《试析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96第2期。
- ④ 指在陌生文化环境中不知所措等。见《英华大词典》(缩印本),Culture条,第327页。



单语文化论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文化,作为译者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对交际、翻译具有积极作用与影响,对语言具有依赖性与不可分割性。关于这一点,笔者曾作过一些探讨,^①在经过一系列相关的探索与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另一种新的见解,即单语文化论会给翻译质量带来不良影响。所谓单语文化论就是指在进行双语互译时过分强调照搬异于译语(或叫目标语)的陌生文化。不可否认,文化对翻译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是首位的,这是公认的。在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尤其是在教学中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在翻译活动中,过分强调单语文化对译事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只会适得其反,严重影响翻译的质量,妨碍翻译目标的实现。诚然,翻译并非简单地用甲种语言符号替代乙种语言符号,并非机械的复制与录制行为。从翻译的三难与三种基本职能可知,^②翻译是一种等值替代,意义、信息之传达,通俗一点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所表达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它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也有很深的学问。可惜曾有人对后者持否定态度。^③可以设想,倘若翻译不是一门科学,会有谁愿意对它作孜孜不倦的探讨与研究,象过去人们试图建立其他科学的理论与知识体系一样建立起翻译科学的理论与知识体系?又有谁会去千方百计地将文化对翻译质量的影响加以探索?说实在话,笔者也不会在此做这种“劳而无益”的“琐事”。上面已经说过



翻译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与“录制”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它有值得注意的深层领域,其中有对比语言学、美学(文艺美学)、修辞学、比较文化学、思维科学、社会符号学等六个纵深层次。^④因此,翻译就不只是一门技术或艺术了。由于文化可能给翻译行为带来积极作用与影响已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因而在初操翻译或翻译不严谨者的群体里存在一种把翻译看作照搬单语文化的认识。然而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单语中所包含的信息与译文中所包含的信息可能不完全相同,其中存在“如艺术与科学的矛盾,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创作与摹仿的矛盾,原作者与译者的矛盾等等,……”^⑤总的说来,外国语言所代表的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所反映的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与思维方式,在社会功能、感情色彩等方面与汉语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译者所面对的恰好是两种不同语言与操这两种语言的人,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两种文化不同的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陌生的文化变得为人所熟悉,使译文伴着文化产生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但是,应该指出,随着世界各国间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适度的文化融合已成为定势;从能否接受这一角度来看,外国文化中确有能为我们了解与吸收的部分,也有不能为我们了解与直接吸收的部分,而人们对此的态度也不尽一致,可谓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单语文化论者会因过分地考虑该国文化而很有可能不去想身边不懂该国文化的读者。这实际上也是译者的态度问题(态度是决定任何事物结局的关键)。翻译对译者的要求是必须考虑翻译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尊重一种民族语言文化的同时,必须考虑本国民族(或说另一民族)的适应度与可接受性。译者的表现要么是宣扬或提倡,要么是摒弃或对此不屑一顾。当然,精华就值得宣扬与提倡,糟粕就要扬弃、批判。^⑥诸如此类说明译者的立场、观点(包括其态度)对译文中的文化处理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文化处理若不当,势必会给译文质量带来不良影响。下面拟从英译汉与汉译英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在英译汉方面,过分强调英国文化往往使译者与中国读者间形成一条无法填补的鸿沟,这条深深的鸿沟使他们无法站到一起来。众所周



达比喻的习语因其中喻体不同于汉语习语中的喻体,中国读者的理解往往与其内涵相去甚远。如 like a drowned rat 不是“象落水的耗子”,而是“象落汤鸡”,as happy as a cow 不是“快乐如母牛”,而是“快乐得象只百灵鸟”,cat on hot bricks 不是“热砖上的猫”,而是“热锅上的蚂蚁”,to live a dog's life 不是“过着狗的生活”,而是“过牛马不如的生活”。(四)表示某种类别意义的普通人名。Jack 是英语中的普通人名,然而它在习语中却表达了非人名之义,如 A good Jack makes a good Jill(或 Gill)(夫善则妻贤,主贤则仆忠),All shall be well, and Jack shall have Jill.(有情人终成眷属),Jack is as good as his master(伙计不比老板差),Jack in office(自命不凡的小官吏,摆臭架子的官僚)。从笔者所收集到的语料来看,含 Jack 的习语至少有 30 条。至于寓言故事所表达的深刻涵义、意义精粹的传说、民间风俗所表达的特种意义、历史故事或历史事件的浓缩义、神话的象征寓意、源于作品中的人或事、总结社会生活经验与反映其中深刻道理的谚语浓缩语、动物名称的特殊含义、植物名称并不指植物、日常用品的其他含义、地名特色特点带来的引申义,笔者曾做过一些探讨。^⑦

在汉译英方面,若只考虑从汉语到英语的语符转换形式,忽视了汉语的文化、风俗习惯等重要因素,即使英语语法正确也是无用的。同理,只注重汉语的文化、习俗等因素,而不考虑英国读者文化的独特性也是无意义的。在此,仍需要采取折中的办法,或者说尽可能地做到适可而止。上文已经说过单语文化论者在英译汉时因强调照搬英国文化导致误译。同样在汉译英中他们往往只会强调如何照搬中国文化。对于任何一位译者来说,其译文所代表的毕竟只是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也是译者必须实现的,因为他负有输出本民族文化的责任,其办法是巧妙地利用英语句子结构、惯用法,调整思维方式,采用释义或加脚注等办法。这些办法贯穿于整个汉译英的始终,占有较大比例。单语文化论者无法做到这些。难免不尽人意或出错。主要表现是:

(一)简单地用汉语句子的结构译英语。如有人由于见到英语中有来自汉语中的 kongfu, wushu, kowtow 等就满以为英语句子的



表述与汉语一致,因而写出了象 I that morning in the dining hall saw her with him eating lunch 这样违背英语句法模式的支离破碎的 Chinglish 句子,象此类句假设出现在文学作品的汉译英中,首先不说令人贻笑大方,也至少会让英国读者生厌。在英译汉中译者若照搬英语的句子结构,同样会使中国读者生厌费解。试想谁会去读这类破碎支离叫人不知所云的东西呢? (二)词序不合英语要求。“多美的景色啊!”被误译为 How a fine sight it is! 而它的正确译法是 How fine a sight it is! 或 What a fine sight it is! 或 How fine the sight is! 实际上,倒装是因受到某词语的影响所致,通过研究发现倒装常与 there, here, now, then, up, down, out, only, often, always once, many a time, as, such, not a single + n., no matter + 疑问词,疑问词 + ever, as ... so, no sooner ... than, hardly / scarcely / ...when / before, how, what, too, quite, rather, half, both, all, something, anything 等词语或结构有关,如“贝各蒂一句话也没说”Not a single word did Peggotty speak (Dickens). 但有时又因句子结构而会出现有悖常规的情况。如 something mysterious 是正确的,但当其用作定语从句的先行词部分时则有不同说法,如“我对他所述的神秘事情感到吃惊”。说 I feel surprised at the mysterious something that he told me. 把握词序至少有两大益处,即避免语法错误与避免引起误解。(三)忽视英汉表述方式的差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被误译为 one's views / outlooks / opinions to the questions,“有丝绒领子的新黑大衣”说 a new black overcoat of a velvet collar, 其实此处译文中的 to 应改为 on, of 应改为 with。“我们不能让阿猫、阿狗都入会”一句中阿猫、阿狗若被直译则会出现文化鸿沟,因为汉语用泛指代特指,用“阿猫、阿狗”代替不具体说出的某种带争议者(如同“张三、李四”);英语则泛指一般人。尤指无权势的普通人,有时甚至含贬义。正确的译法是 We can't admit every Tom, Dick and Harry to membership of the club. (四)把抽象意义



的数量词直译成英语数量词。“五脏六腑”本是人体内器官的通称，不可译为表“五”、“六”的文字，在既定情景中也不能译为 the internal organs of the body，如冯骥才的《神鞭》中有这么一句：他五脏六腑总觉得空荡荡，没有根，底气不足。可译为 Still, he always felt a certain emptiness inside, as if rootless, lacking a core of strength. 从译文可见“五脏六腑”的本义已消失且更不见“五”、“六”的踪迹，一旦译出则是误译或死译。“五湖四海”汉语中虽带数量词，但泛指全国或世界各地，也比喻各个角落，无任在何种语境中肯定不能译为带“五”与“四”的文字，虽然可译为 all corners (或 places 或 parts) of the country (或 the world 或 the land) 等，但在既定语境中也不可如此，如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一句，由于此处的“五湖四海”比喻广泛的团结，因此宜译为 We must achieve extensive unity. (五)译文中用汉语喻体取代英语喻体。如汉语所说的“爱屋及乌”中的喻体是“屋”、“乌”，该成语源出《尚书大传·大战》：“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乌就是乌鸦，比喻爱一个人而连带喜爱跟他有关系的人或物，英语则说 Love me, love my dog, 显然其中的喻体不同于汉语喻体“屋、乌”，一旦使用汉语喻体，于英国读者来说是难以说得过去的。但在一时无法确定用英语喻体替代汉语喻体而又唯恐英国读者费解时也可采用适合英国读者的释义法，以使译文在内容和修辞上与原文保持一致，不至于使其感到陌生。(六)直译汉语典故性成语加注过多。为了保留汉语原文的民族特色与形象，英译文须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才能获得，但加注过多既影响译文质量又影响读者连贯理解。如“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⑧英译为：This Sima Zhao trick is obvious to every man in the street. 此译文似乎无可挑剔，然而 Sima Zhao 何许人也，英国读者不得而知，加注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方能解英国读者心头之疑。因此可加上这段恰到好处的译注：Sima Zhao was a prime minister of Wei (220—265AD) who nursed a secret ambition to usurp the throne. The



emperor once remarked, "Sima Zhao's intention is obvious to every man in the street."至于其图谋篡政的种种细节则不在此处考虑之列。否则会显得本末倒置,不得要领。也会使读者心目中的主题发生改变。笔者认为,若只考虑其比喻义“人所共知的阴谋、野心”也可不加注。而且 Sima Zhao 已消失。如《中国成语汉英双解大辞典》(1993 年版)所提供的 5 种译文就是如此,另举的一个译例是:他宣称,他这一举动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惜我们没机会阻止他。译文是 He declared it was in common interests that he made such a move, but his ill intent was obvious to everyone. It was a pity that to stop him was beyond our power.

以上从英译汉与汉译英两大领域的多个方面探讨了单语文化论会给翻译质量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因笔者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挂一漏万,也不可能解决好文化对翻译质量影响的所有问题。但是笔者的目的是试图以此和同行一道探讨,摆脱单语文化论对翻译的束缚,使翻译质量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

注 释

- ① 李延林:《汉英民族话语交际中的文化问题》,载《铁道师院学报》1998 年第 6 期。
- ② 张经浩在《中国翻译》1993 年第 3 期撰文说:“翻译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或者艺术”,见《翻译不是科学》一文。
- ③ ④ 雷祎:《开拓与创新——刘宓庆的翻译理论与评述》,《中国翻译》1993 年第 3 期。文中提出了翻译理论研究具有认识职能、执行职能、校正职能。
- ⑤ 许钧:《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国翻译》1997 年第 3 期。
- ⑥ ⑦ 李延林:《小议英语典故性成语的来源与汉议》,《中国翻译》1999 年第 3 期。
- ⑧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1 页。



英汉/汉英翻译中的文化再现

关于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翻译界已有不少论述。在众多译论中,功能翻译派的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功能派翻译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于德国,其代表人物为 Katharina Reiss、Hans Vermeer (Reiss 的学生)、Holz Manttari 以及 Christiane Nord。功能翻译理论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Katharina Reiss(1971)首先在她的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的雏形。一方面她仍然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另一方面,她也发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有时也是不该追求的。Reiss 的学生 Hans Vermeer 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的目的论(skopos-theory)。Vermeer 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而且因为行为的发生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同的文化又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翻译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Vermeer 也激烈反对把翻译看作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问题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文化转换(cultural transfer),并且在他看来,译者应具备两种文化方面的知识(be bicultural)。他对翻译下的定义是: I have defined translation as information offered in a language of culture which imitates information offered in language A of culture A so as



文读者熟悉的形象,或者舍弃形象意义,只译隐含意义。总之,隐含意义,是原文意欲表达的意义,是翻译中要恰当处理的最重要的意义。

在翻译的方法上,直译和意译一直是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通过对一些翻译理论及资料的学习与实践,我们认为,直译和意译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相互联系,且没有明显的界线。比如“三藏法师”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以说是直译,但较之类又净那样诘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可见文与质并无一定的标准,直译和意译也难作截然的区别。大到一部作品,小到一个句子的翻译都会兼用直译和意译。一件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如果采用直译能准确传达译文多种意义的,就采用直译;如果不能译出原文多种意义,不能准确译出隐含意义的就采用意译。

综上所述,在翻译中我们完全可以把英汉习语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加以具体化。

2.1 直译

由于人们在感情、在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及社会经历等方面会有相似之处,英汉习语中有少量相同或近似的习语,这些习语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相同或近似,甚至隐含意义也相同。也就是说,此类习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可以互译。如相同的有 the golden age 与“黄金时代”;to show one's cards 与“摊牌”;to turn over a new leaf 与“揭开新的一页”;“Easy come, easy go”与“来处容易,去得快”;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 与“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Sing different songs on different mountains 与“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相近似的有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与“混水摸鱼”;put cold water on 与“泼冷水”;spend money like water 与“挥金如土”;a thorn in the flesh 与“肉中刺”,等等。它们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相似,隐含意义相同,所以可以互译。此类习语直译,保存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保留了原文



“have a well-thought plan before you succeed in something.”汉译即比喻做事之前,先要做全面的考虑,又如英语习语 a cat on hot bricks 中的形象是一只 在炽热的砖头上行走的猫,痛苦而狼狈,这个情景和汉语的“热锅上的蚂蚁”不谋而合,都表示“焦急而狼狈”,翻译时更换了形象,更利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类似的习语还有 as mute as a fish 与“噤若寒蝉”,no room to swing a cat in 与“无立锥之地”,neither fish nor fowl 与“非驴非马”,like mushrooms 与“雨后春笋”,等等。

有些习语在翻译时无法保留原文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而只能译出它的隐含意义,如“眉飞色舞”若死译为“his eyebrows are flying and his countenance is dancing.”势必会贻笑大方,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莫名其妙。我们可灵活地把它译为“to beam with joy.”又如“天有不测风云”,若把它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毫不保留地译成英语,会使英文读者不知所云,因为汉语中“风云”的文化含义一般的西方人很难理解,若把它的隐含意义译出,就会一目了然: something unexpected may happen any time. 另外,汉语中的“气管炎”作为一种疾病与英语中的“tracheitis”对应,但与“妻管严”谐音时则具有“怕老婆”的隐含意义。某人开玩笑说:“他有气管炎”,若译成“He suffers from tracheitis.”外国人看到或听到不但没有笑,反而感到莫名其妙,问道:“So what? Are you laughing so hard when he is suffering from tracheitis?”如译成“He is a hen-pecked man.”可能更自然对等地再现其文化色彩。这种情况在源于典故的习语中常见。如 Judas' kiss 若直译为“犹大之吻”则会使读者对译语感到陌生。为使译语更贴切达意,我们可转换形象,译为“假亲热”,口蜜腹剑,阴险的背叛。诸如此类的还有 Achilles' heel 与“唯一致命弱点”,pull one's socks up 与“鼓起劲儿”,Gordian knot 与“大难题”,等等。如果以上三个习语依次直译为“阿克勒斯的脚后跟”、“挂起你的袜子”,“戈尔迪死结”并不能让大多数人理解,而译出其隐含意义则更恰当。



又如习语 rain cats and dogs, 其意思不是“落下的猫和狗”, 而是“下倾盆大雨”; 再如, “I am under the weather.” 句中 under the weather 是 unwell 或 unhappy 的意思, 不是在“天气之下”。类似的例子还有 fight like cat and dog. 如果按字面意义译成汉语, 虽保留了原文的形象, 但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We still love each other very much, but we fight like cat and dog. 可译为: “我们常吵吵闹闹, 但仍很相爱。”

2.3 增译

还有一些习语, 其中的形象直译后虽不会产生文化冲突, 但会造成语用失误, 译文读者不能理解其含义。译文可直译其字面意义, 再点出隐含意义, 使译文形象生动, 体现出原文的风格和韵味及其略去的部分。比如: 黄鼠狼给鸡拜年: The weasel goes to pay his respects to the hen——harboring no good intention. 肉包子打狗: chasing a dog by throwing meat dumpling at it——gone, never to return. 老虎吃天: A tiger wanting to eat the sky——not knowing where to start. 兔子尾巴: The tail of a rabbit——can't be long.

2.4 注释法

有的习语只有在历史背景和典籍出处得到说明以后才能充分表达它的意义, 所以译者有时须酌情考虑利用注释法使习语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及隐含意义充分表达出来。例如“叶公好龙”直译为 Lord Sheh's love of dragons. 然后另加注释: Lord Sheh was so fond of dragons that he adorned his palace with drawings and carvings of them. But when a real dragon heard of his infatuation and paid him a visit, he was frightened out of his wits. 再如“杞人忧天”, From time immemorial no one but “the man of Chi worried lest the sky fall,” meaning that only one man from henna was afraid it might happen.



2.5 其他

有些字面上看似一样,而隐含意义却相去甚远的英语习语,往往破译者会站在同一文化渊源的角度去加以认同,其实它们是形似意不似,不能互译。如 a walking skeleton 与“行尸走肉”,前者指人瘦得只剩下几根骨头,译为“骨瘦如柴的人”,强调人的身体状况。而“行尸走肉”则指“精神空虚,不动脑筋,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强调人的精神状况。pull sb's leg 和“拉后腿”,前者意为 try for a joke, to make him believe something that is untrue(和人开玩笑),汉语“拉后腿”指阻挠别人或牵制别人的行动。

有些习语本身就含有褒贬义,翻译时不可随意对应。如 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与“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前者为否定句 fine feathers don't make fine birds,使用肯定句带有讽刺、挖苦的意味,说明“华丽诱人的外表并不表示优美和能力”(an impressive or showy appearance is no indication of merit or ability),显然是贬义,汉语却是褒义的,说明“人们穿上好看的衣服才漂亮、精神”,两者正好相反。再如 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will appear 与汉谚“说曹操,曹操到”,前者中的 devil 有贬义,而汉语中的“曹操”并无贬义。

以上分析了英汉习语中所体现的英汉文化差异,并受语用学中有关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在英汉习语翻译中首先要保证原文隐含意义的准确表达,在没有文化冲突的情况下兼顾形象意义和字面意义,并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正确译出原文的褒贬意义。由此出发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采用直译或意译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有时英汉两种语言使人产生的联想和理解不尽相同。只有了解和掌握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注意中西文化差异,更好地理解这些表达方式的意义和用法,才能有较好的译文。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英汉习语亦然,非一篇短文所能涵盖。